

电话: 010-62515049

邮箱: nads_ruc@126.com, nads@ruc.edu.cn

网址: <http://nads.ruc.edu.cn>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RUC Perspectives

政策简报

学术思想的传播者，科研成果的转化剂。

学术为民，辅弼国政，高端智库责无旁贷。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主编：刘元春 责编：刘晓光 聂辉华

2015年 第3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为研究框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特色研究领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中国人民大学优质智库资源而打造的、独立的非营利实体研究机构。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对当前中国与世界面临的紧迫性问题进行政策与战略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三大核心研究领域，形成了十大核心研究团队，致力于打造成为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

理事会：

理事长：靳诺

副理事长：陈雨露、裘国根

理事：王利明、毛振华、阎庆民、查显友、张宇、刘元春

院务会：

院长：陈雨露

执行院长：刘元春

副院长：杨光斌、聂辉华、王莉丽、伍聪

“十三五”规划专题

近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全面步入“新常态”，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为促进观点交流，本期《政策简报》专门汇编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家学者有关“十三五”规划中提及的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发展、对内区域协调发展、能源环保、社会保障建设、新增长动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 国有企业改革

“十三五”规划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引导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杨瑞龙教授：国有企业改革不应该“一刀切”，基本逻辑是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企业，其中，非竞争性的国

有企业并不易采取全面市场化的标准，而竞争性的应该按照完全市场化的原则来进行改造。这一分类改革的路径与当前国家提出的改革逻辑是基本一致的，而不同的就是此次国企分类更加开放一些，将自然垄断类的一些重要企业放在了商业类里。在此次分类中，公益类国有企业应该采取国有国营，但也可以引入市场因素，比如外包、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而总的来说，这类的企业应该完全贯彻社会目标、社会效益，而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就应该逐渐市场化。事实上，我国进行国企分类改革背后是有理论逻辑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国企改革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逻辑，也不能完全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而是要在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搞市场经济，这就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下我国选择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模式还是很清晰的，就是我们走的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国有企业不仅要在国际竞争格局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部分国有企业还需要完成一些社会目标。

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那天起，混合所有制就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现在继续谈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意义是在于我们要进一步在制度上肯定国有企业里面可以包容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当前国企分类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确实有了一些新发展，《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鼓励央企整体上市、国企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等新举措，都会给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统意义上纯而又纯的那些国企可以有多元化投资主体，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其次，一般性竞争企业里面不再要

求国有资本的绝对地位，更加开放；最后，就是允许国企内实行员工持股制度，这将有助于改善国企的激励机制。这些方面的新发展不仅能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更多的变化，而且也将有助于加快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聂辉华教授（国发院副院长）：对于当下国企改革，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特别是加快垄断性行业的国企混改步伐。目前来看，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混改比较有效，其效率显著高于纯国有企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营资本的进入有助于规范国企的公司治理机制。下一步的重点是推进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引入民营资本，加速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第二，将国企分类改革思路与完善市场竞争环境结合起来，通过营造竞争性市场环境给国企改革提供动力。目前国企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将所有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要警惕有关部门为了既得利益，将所有在垄断性行业享有市场实力的国企全部划入“公益类”，从而延缓国企改革步伐。建议对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行科学细分，并作为“负面清单”向社会公布。绝大部分国企应该属于商业类，应该通过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来改进效率，以市场化手段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加快国有企业的薪酬改革步伐，使国企员工的薪酬能够反映实际生产率。第四，先市场化改革，再推行股权激励。对于竞争性国企，可以推行员工持股；但是对于垄断性国企，应该先进行市场化改革，然后再推行员工持股。第五，要从根本上改革国企，必须明确国企定位。建议少部分承担政治和社会职能的国企，应被划入公益类国企，作为“特殊企业”存在，不参与市场竞争；大部分国企应只承担经济职能，它们应该

被划入商业类国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其去留。

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加强了其他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

许勤华教授：资源价格改革是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的关键，实质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最终实现“竞争性环节由市场定价、自然垄断环节由政府监管定价”的资源行业市场化改革。当前，中国深化资源改革主要有三大挑战：首先，资源价格市场化定价机制的框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意义上具有竞争意识的市场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并未成熟；其次，没有能够根据不同资源品种的特点、类型细分市场，以完善价格定价体系；第三，没有回复到经济的基础关系，使价格机制充分反映资源生产的成本。因此，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让价格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其次，科学界定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业务。其次，对电网、油气管网等自然垄断业务，要加强监管，保障公平接入和普遍服务。最后，要加强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世界各国的能源管理实践表明，必须利用市场竞争和政府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持续发展。资源价格体制改革没有世界通行的模式，需要我们进一步系统研究并实践。基本思路主要为：优化资源产业组织结构，积极培育资源市场竞争主体；加强资源年市场体系建设，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格局，促进资源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建立健

全的资源财税金融体系。

◇ 金融体制改革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具体包括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

刘元春教授（国发院执行院长）：我国金融业的盈利秘诀，一是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使之在与实体经济的谈判中享有绝对的议价权力，二是金融管制特别是利率管制，使之享有绝对的利差。金融业总体呈现的特点是，利润和增加值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中崛起，在世界整体金融业利润下滑的环境中一枝独秀。这种一枝独秀反应的并不是中国整体竞争力的强化，而是中国经济内在扭曲正在加剧。中国目前的最大扭曲就是金融在实体经济萧条的基础上出现快速膨胀，现有金融制度在持续僵化中成为“吸金法宝”，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陷入“高债务-高成本-低动力”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在全球行政性垄断和管制的作用下已经陷入了“过度金融化的困境”之中，金融已经在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自我游戏中成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崛起的主要障碍。因此，应当通

过打破金融垄断和金融管制，摆脱“过度金融化的困境”，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中国金融市场进入的壁垒、中国金融监管的过度行政化和板块化、中国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培育以及不能适应现代融资要求的价格管制都应当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陶然教授：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也要注意泡沫经济下中国金融改革的风险。经济下行时期过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短期内会对实体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将加速经济下行甚至引发资产泡沫破裂。国际经验表明，宏观经济过热与宏观经济衰退期都不是推行利率市场化的好时机。特别是经济衰退期，优质客户减少，银行不良资产本来就会增加，一旦放开贷款利率，银行为盈利必然会强化对优质客户的竞争，结果这部分利率下降就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因市场疲软，银行必须对一般客户贷款提高风险溢价，又会增加这部分贷款企业的成本，最终可能增加银行不良资产。此外，存款利率过快市场化会削弱银行的危机应对能力。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放开或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过快，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在收入大幅减少时为维持经营不得不争夺存款。结果是银行利差缩小，盈利能力进一步降低，甚至会出现有些存款机构亏损倒闭。

利率市场化成功需要构筑坚实的金融微观基础，放宽银行业准入，努力培育竞争性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机构能力、完善短、中、长期基准利率形成机制后再推动。金融改革也必须与实体部门配套改革。金融改革本质上要为实体部门改革和经济增长服务，但实体部门改革又可以通过拉动增长的方式巩固金融体系，减少坏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

金融改革模式与内部顺序选择也非常重要。虽然中国经济改革中“自下而上”试点的方法一直被认为意义重大，但在金融领域“先局部试点、后全面推广”的模式却未必有效。这是因为金融资本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进出试点区域，不仅导致试点效果难以评估，而且还可能带来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套利、财富超常规再分配等问题。金融改革内部的顺序选择也非常重要，只有当实体部门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都得到有效推进，国内经济抗御金融风险、尤其是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后，才可以考虑谋求全面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

◇ 对外开放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王义桅教授：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开放”作为发展理念加以强调，通过开放型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中心大国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与“开放”紧密相连，全球的资源都会被“请进来”到中国参与配置，而中国也将“走出去”参与全球资源配置。

田野副教授：开放发展总是与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改革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时，对外开放可以为国内改革增添动力，所谓的“倒逼机制”就是通过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首

先，更高水平的开放意味着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国家间更大程度的自由流动，但是这种跨国自由流动本身并不会自发推动国内改革。作为国家间合作与竞争的规则，国际制度可以替代和部分替代国内制度，从而实现制度变迁。其次，如果政府的改革承诺缺乏可信性，约束性强的国际制度比约束性弱的国内制度能够为国内改革提供更大的动力。再次，由于改革是由国家决策者主动推进的制度变迁，只有当国家决策者的偏好于国际规则、规范一致时国际制度才能推动国内改革。中国在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以及应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战略时，不仅需要审慎考虑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上的成本收益，也需要通盘考虑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和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领域中改革所面对的种种挑战。

时殷弘教授：“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开端。“十三五”规划将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更全面详尽的布局，它们在某些部分和某些维度上可以也应当是开放性更大的国际合作事业，可以也应当有选择地欢迎沿途国家以外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参与。这有助于提高在资本、技术和经验意义上的效率，减抑一方面的战略性猜疑和另一方面的战略性自满，同时大概也符合沿途中小国家的愿望和利益。

◇ 对内区域协调发展

“十三五规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有序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推进交通一体化，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高起点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分工协作。

孙久文教授：在积极进行对外开放、完善开放战略布局的同时，我国也从内部着眼，更加注重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次区域战略的核心是突出区域发展的差异性，特别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发展和空间布局方面将达到三次规划的最高高度。

郑新业教授：对于京津冀经济带，体制改革是关键一步。理解大战略下的京津冀，只有理解了它的大目标，才能更好的理解政策、评判政策、预言政策。首先要重视“新七点”中的“五化”产业，注重绿色发展和穷人发展，同时不能忽略北京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维度；其次，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改革，光在省级层面做事情是不行的，财税体系才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例如动物园批发市场，只要稍稍提税，它都会面临较大的危机，整个过程是不需要行政手段的；最后，污染的问题，北京的责任更重，当然也有人说要区别责任，这个意识并没有错，但若是从责任的角度讲，供给方是河北，需求方则是北京。另外很多人说北京是“灯下黑”，这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首都在，房山、昌平、延庆将全是国家贫困县。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开放体制下，华北平原并不是优先发展的地方，所以不是旁边的“灯下黑”、贫困县多，而是北京的灯不够亮，只照了房山等地。

◇ 能源和环保

“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

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改革能源体制，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我国将形成未来中长期的总体能源战略体系，具体包括已经出台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以及正在制定的《能源安全发展战略》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5-2030）》。与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相适应，我国也在积极推行相应的环保新举措。“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许勤华教授：从发达经济体的实践来看，优质能源对于提升经济质量贡献度不断加大。在环境压力下，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加快进入“气体能源时代”的趋势。中国各级政府应在能源消费革命中重视天然气的作用，在新的能源时代抢占先机。

罗来军副教授等：中国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具有“天生”般的困难，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能源禀赋状况总体来说是“富煤、少油、缺气”，由于煤炭储藏量很丰富，而且油与气又缺少，煤炭的供给和消耗就“天然”地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经济的现有发展态势和未来发展趋势，都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耗，化石能源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主体的格局难以改变。即使是在资本和科技积累基础非常雄厚的工业化发达国家，目前也无法摆脱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从优化能源消耗结构的角度看，需要减少对化石能源消费的依赖，增加和发展低碳和零碳能源。因此，中国推进低碳发展的能源之路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特征，需要在资源禀赋、技术状况和产业状况等约束条件下发展和调整中国的能源消费。

郑新业教授：在考虑利用新能源时，也要对新能源的综合收益与成本做全面考量。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利用存在电网成本。在发电低峰期，需要备用电厂发电以稳定电能供给。风能和太阳能的产能越大，备用电厂规模就越大，维持备用电厂运行的成本就越高。全面考量新能源利用的成本，有利于发现能源之间的相对价格，促进资源有效利用。

魏楚副教授：在中国，恰当的环境管制政策是可以推动中国工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国目前处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以及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环境管制仍然是必要的政策工具，缺乏必要的管制政策，经济系统不会自发或者提前越过环境库兹涅兹拐点而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其次，对于环境管制的形式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偏重于污染治理项目的资本性投资，那么可能对研发没有显著效应，但对行业的绩效会产生促进效应；如果偏重于污染治理的日常营运和管理，则可以促进行业的研发活动。对于具体地区和部门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两种管制形式的相互补充的，需要因地制宜，根据现实需求来设定每种管制形式的相对权重，从而更好地帮助实现决策目标。

◇ 社会保障建设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陈雨露教授：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优化结构和寻找经济

增长的新动力，需要聚焦在人口、能源、金融三大领域。人口方面，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十年，对养老产业的有效需求是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经济增长点，能给中国赢得 8 至 10 年的时间。

郭杰教授等：中国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诸多不公平，而且社保基金的运转也存在不少问题，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财政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障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需要吸取欧盟国家的经验教训，确定合理的目标模式，既要保障每个人生存发展基本需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又要防止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具体而言，在进行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政策调整时，要以生活保障代替收入保障。所谓收入保障就是发放养老金，而生活保障是直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的目的。在当前财政条件下，可以采取以生活保障代替收入保障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措施有两点：第一，大力兴建养老院，同时引入民间资本，而政府则充当其中监管者。兴建养老院，可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而引入民间资本，则可以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为了激活民间资本，要允许养老院采取盈利模式，财政主要作用则是对养老院进行监管，评定养老院星级，同时按星级给予财政补贴。第二，作为对养老院的补充，可以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养老是相对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而言的，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在继续得到家人关怀的同时，由政府补贴，社区承担养老服务和组织老人集体活动；二是指根据发展规划，建设老年人集中居住的大型专业化社区，这种社区通过设置完善的健康、娱乐配套设

施，具备了良好的护理条件，老年人在这种社区可以参与同龄人的集体生活。此外，社区养老还有一个好处，它需要大量工作人员，为下岗职工和有志于从事社会服务的人士提供就业岗位。

宋月萍副教授：老年人有住房财产更可能提升子女代际支持的水平、进而降低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概率，没有住房财产则可能削弱子女代际互动的意愿、进而增加老年人遭受虐待的风险。因此，“以房养老”作为一种贷款政策，在当今中国可能并不具备普适意义和推广价值。“以房养老”的政策设计中，尽管城镇老年人可以通过将极具升值潜力的财产变成有生之年的固定收入而使现实效用得到提升，然而子女养老的预期效用却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不利于代际关系和谐，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从金融机构中获取了经济收益，却也在子女处丧失了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甚至遭受到虐待。

◇ 新增长动力机制

“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

刘晓光博士：“十三五”期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失速的风险，亟须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和实现新的技术进步，加快形成新增长动力机制。为此，“双创”成为“十三五”的一个重要名词，也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一方面，通过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拓展发展新空间，包括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网

络经济空间和蓝色经济空间，发挥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落实金融和要素领域改革。此外，“十三五”规划还通过强化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例如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以及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

同时，“十三五”规划的一些关键领域改革也将释放新的市场活力，激发新的增长动力。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总体思路，并同时解决了农民进城落户和城镇吸纳农民落户的激励机制问题，为“十三五”时期实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显著提高提供了保障，也有助于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目标。户籍人口城镇化有望取得实质性进步，这将会释放巨大的市场活力，激发新一轮增长动力。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不仅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还将显著地提高城镇住房需求，加快消化房地产库存，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和发展。二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仅有助于提振消费需求，还可能会提高房地产需求以及对未来需求的预期，从而可能会加速房地产市场复苏，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三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这些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激发市场活力。

在我国面临传统行政理念的转换、市场自由的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经济格局的重构等新老问题的交汇之时，“互联网+”发展理念或经济模式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形式，成为助推中国经

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产业变革、文化发展和国际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金元浦教授：“互联网+”是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升级版，能够促进硬实力条件下的软实力提升。它在内涵上根本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是重新定义后跨越式发展的新的互联网概念和文化创意产业概念。概括起来讲，“互联网+”是创新 2.0 下的，也就是新的创新概念之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 2.0 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的演进。它推动了我国文化科技、文化经济的发展，进入到实质的发展之中。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很显然是准备阶段的工作，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常态”的重要特点，就是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的非产业形态的东西进入到产业，并进入到融合的新时代。

董天美助理研究员：“互联网+文化”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它能够极大激发了大众的消费意愿，消除了各产业间的壁垒。推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是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催生新业态、带动就业、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经济发展业态。它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